

第一章

南方“新贵”

- “火箭式”新干部
- 中央银行之父
- 财经“沙皇”
- “为革命行苛政”

“火箭式”新干部

“人生能有几回搏”，这是一句现代的豪言。不过，对于人生的智慧和经验来说，它的确不是一句高调，也不是一句诳语。人的一生，有许多关口，亦即有许多挑战和机遇。对于人生来说，这是一种选择，也是一种拼搏，还可能会是命运的大变化与大转折。1923年2月，宋子文所面临的境遇，就是这种人生的大选择与大转折点。

29岁的年轻人，在著名的汉冶萍公司，当过上海办事处秘书，也当过汉阳总公司会计科长。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，这样的人生境遇，不能说不好，不行；“炒”老板的鱿鱼。于是，跳到联华商业银行，跳到大洲实业公司，跳到神州信托公司。从1917年回国，前后只有四五年的时间，“炒”老板已经“炒”了四五个。这真是一个抱负很高，不满足运命的年轻人。

一次次的跳槽，当然是一次次的不满意。可以看出，这是一种不安分，也是一种野心。然而，未尝不可以认为，这也是一种期待与追求！现在，又当上了华义银行总经理。尽管华义银行只是个小银行，但是，对于一个有理想、有抱负的年轻人来说，缺乏的不是前景与前途，缺乏的只是经历与经验。饭要一口一口地吃，路要一步一步地走，大银行是从小银行来的，大银行的总经理，难道不是从小银行总经理来的么？然而，还是不满意，去意

再一次萌生了。不过，实业界干过了，金融界干过了，还能到哪儿干呢？不要紧，好在二姐庆龄已经从南方来信了，要他到南方去帮忙。一切正透露出一个新的人生际遇！

2 月间，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东郊农林试验场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府，就任陆海军大元帅职。开府伊始，缺钱，缺枪，缺炮，缺实力；当然，在聪明的政治家眼里，最缺的还是人才。有了优秀的人才，可以弄到钱；有了钱，就能弄到枪，弄到炮。有了枪炮，就有了实力，这是一个简单不过的道理。可是，优秀的人才在哪里呢？在夫人的提醒下，中山先生想到了子文。宋子文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硕士，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，还在“世界金融之都”华尔街花旗银行有过一番历练。老实说，在 20 年代，这样的中国人，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。

但是，从宋子文的角度说，究竟去不去南方？不能不有一番权衡，也不能不有一番布置。二次革命以来，姐夫已经三次在广州开府。第一次失败了，第二次也失败了，第三次难道就一定会成功么？这是宋子文不能不想到的问题，他不能不提出这个疑问！姐夫是一个革命家，二姐也是一个革命家。革命家是不计成败的，只要没有成功，他们还会接着干。但子文不是革命家，他只想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只想做一个成功的金融家。而企业家和金融家是不善于面对失败的。这是他与姐夫孙中山不同的地方，也是他与二姐宋庆龄不同的地方。

不过，宋子文小时候受到其父宋嘉树的影响，长大了，又受到二姐的影响，对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，虽没有坚定的信念，但始终怀有好感，不希望革命失败，这是没有疑义的。况且，回国已经 5 年了，从汉冶萍公司，到联华商业银行，到大洲实业公司，到神州信托公司，再到华义银行，宋子文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时代的压迫，也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封建贵族的压迫，一切的抱

负,一切的追求,都还无从谈起,便是与盛七小姐的恋爱,也在盛家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而凋谢了,这是他最感耻辱的失败经历。对于老年人来说,沉痛的失败,也许只是冬天喝下了一碗凉水,从此慢慢地消沉了;但对于年轻人来说,沉痛的失败,则好比是夏日喝下了一碗烈酒,只会激起年轻人复仇的欲望。

此时的宋子文,便是这样的心境。也许是受野心的刺激,期望着有朝一日能借助革命的成功,报复盛家的白眼;也许是为了忘却年轻人失恋的痛苦,换一个全新的环境,改变一下压抑的心情;也许是受到家族拓荒与冒险精神的影响,决定到多彩多姿的南方碰碰运气吧,于是,宋子文决定响应二姐庆龄的感召,丢下了华义银行总经理的宝座,丢下了上海的优裕生活环境,投奔南方革命阵营去了。

说到运气,真是一个不可不信,亦不可全信的东西。曾国藩晚年曾说:“不信书,信运气。”以“曾圣人”的一生体验,竟得出这样的结论,可见,运气这个东西,不可不加以注意。本来,子文的这次南下,在很大程度上,是带有负气的成分。在上海,与赫赫有名的盛氏家族闹得颇不开心;“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!”到南方碰碰运气吧!偏偏这一碰,竟碰出了一生的飞黄腾达。

中山先生一生服膺革命,可是,从没有获得成功的纪录。同盟会时期,几十次的武装起义失败了。后来,辛亥年的革命失败了,1913年的二次革命失败了,1915年的护国运动失败了。为领导南方的护法运动,1917年第一次在广州开府失败了;1920年第二次在广州开府失败了。这次是第三次在广州开府,就一定会成功么?革命30多年了,国人看到的孙中山,从来只是一个失败的英雄。一次次的失败,使得许多追随者对革命发生了动摇,并由此而离开了中山先生。然而,就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从失败走向成功的转折时期,宋子文加盟进来了。这不能

不说是宋子文的成功，也不能不说是宋子文的运气。

有人说宋子文这一次南下，是商人的一种投机心理，看准了中山先生一定会成功，才投奔南方政府的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倒未免抬高了这个多少有点纨绔气的宋大公子。老实说，不但宋子文不可能有这个眼力，便是一批长期跟着中山先生打天下的元老重臣，也未必有这样的眼光。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，若以商人的投机手腕而言，宋子文不及他的大姐宋蔼龄多了。早在民国初期，宋蔼龄就是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，革命资格比宋子文老多了。然而，这个时候的宋家大小姐，正伴随她的白马王子孔祥熙，推行其‘稳健’政策，在北方按兵不动，冷眼坐观南方的成败。事实上，即便英明伟大的孙中山先生，虽然对革命有着必胜的信念，但也未必对这一次的开府，有着成功的绝对把握。

但是，正像广告词里所说的那样：“付出总有回报”。因为有了无数次失败的教训，又因为有了两次开府遭挫的经历，第三次建立的南方革命政府，才有了获得成功的基础。如此，这才有了宋子文在南方政坛的崛起，“潜龙在野”一变而成为“亢龙在天”，从一个无足轻重的钱庄经理，一个商界跑龙套的小角色，一跃而成为南方政府的财政大臣，成为一言九鼎的南方“金融沙皇”，真可谓横空出世，一飞冲天。

所谓“赶得早不如赶得巧”。对于中山先生领导的南方政府来说，宋子文只是搭了一个末班车，却抢了个早市。3月间，子文出任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，这是大姐蔼龄、二姐庆龄的旧职，也是子文政治生涯的开始。虽然，就职务而言，这个位置并不算高；但是，每天都可以接触到南方政府的大人物，也可以熟悉大本营的一套运作程序。显然，这是一个过渡，更是一个历练。

果然，4月间，子文便有了新职，转而出任中央银行筹备员。对于子文来说，干金融，这是他的所长，也是他的专利。在美国老大哥

那里，学的就是这一套么！子文办事，真是雷厉风行。5 月间，中央银行便已成立，老资格的革命党人林云陔出任中央银行行长，宋子文任副行长。虽屈居副手，但看得出来，这是个管事的人物。

10 月间，宋子文出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。用现代的官职比照，大致相当于两广税务局长。这不但是一个独当一面的要职，更是一个让人垂涎的肥缺。事实上，在不少元老人物看来，这个大元帅的小舅子，半年前还是一脸的稚气，而现在已经是跻身于南方政府的新贵了。半年三迁，真让人看了眼红。

如果说子文南下，第一年坐的是特快列车；那么，在随后的几年里，搭乘的就是直升飞机了。1924 年 4 月，宋子文被任命为广东省财政委员会委员，这是向财政高层迈出的第一步。8 月间，宋子文升任中央银行行长，成为南方政府的阁僚。一年多以前，宋子文还只是上海滩上名不见经传的钱庄经理，而现在已经是南方政府最年轻的内阁大臣，掌控国民党金融事业的最高主管。虽然，从副行长到行长，只是顺理成章的一次升迁，算不上放了一颗卫星，但 30 岁的年轻人就当上政府阁僚，在一个老成人的国度里，不能不说是一次破格的任用。

不过，那是一个非常时代，也是一个不断出现奇迹的年代。在今天被看作是意外的变化，在那个时代正是一种常态的演变。1925 年，宋子文的仕途，已经由坐直升飞机改乘波音客机了。是年 3 月 12 日，孙中山在北京逝世。对于宋子文来说，这不啻是失去了一道像青藏高原那样巨大的政治屏障，当然是一个无可估量的损失。但是，由于两年来的杰出表现，也由于中山先生的崇高威望，宋子文已经像一棵大树，在南方那块陌生的土地上扎根了。是年 7 月间，宋子文兼广东省政府委员及商务厅厅长。这是在中山先生逝世后，宋子文得到的又一个政府高职。这说明，尽管失去了中山先生的扶持，宋子文的政治前途并没有受到

大的影响。由省财委委员到省政府委员，由金融到商业，宋子文主管的范围正不断扩大。一切都预示着，子文的政治仕途正如日中天。

曾国藩看人论相曾有一说：“邪正看眼鼻，真假看嘴唇，功名看气概，富贵看精神，注意看指爪，风波看脚筋，若要观条理，全在语言中。”灵验与否，当然是姑妄言之，姑妄听之了。不过，从宋子文的面相中，的确看不到那种治国安邦的宰辅相。广州时期，许多与宋子文有过一面之缘的人，都有这样的感觉，与宋家那几个国色天香相比，宋子文给人的第一印象，实在是太逊了。五短身材，淡而无味，一副恭喜发财，拜托拜托，与世无争的面团相。虽然和蔼中透着一种严厉，但严厉中又不失有事好商量。活像钱币上的头像，笑得很威严，但又颇感勉强。在人们的印象里，这种人大都出现在东家的账房里，终日查看账簿子上的蝇头小楷。谁能想到这样的人会走上政坛，成为未来国民党广州政府、南京政府的重臣哩！然而，机会说来就来了。

是年 8 月，在南方政府内部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国民党左派领袖、广州政府财政部长、中央银行董事长廖仲恺先生被右派势力暗杀。就政治立场而言，宋子文属于中间偏左，与廖仲恺先生较为接近；就私人关系而论，廖仲恺对宋子文是十分爱护的。多年来，廖仲恺一直是南方政府财政主管，宋子文能够在南方崛起，尤其是能够获得中央银行行长的要职，就是廖仲恺大力举荐的结果。廖仲恺先生的被害，对宋子文的发展，不能不说是一个负面的因素。

但是，政治的发展，有它自己的轨迹。政治上，一个大人物突然消失了，往往有如一颗恒星的塌陷，由此而产生巨大的引力。现在，廖仲恺惨死了，随之是南方的中左派力量对右派势力的一致声讨，许多右派分子不是被逮捕，就是落荒而逃。原先左

右两派势均力敌的局面，顷刻间成了左派的天下。廖仲恺生前的主张，正在被形形色色的人争相颂扬，有真心拥护的，有随波逐流的，有静观待变的，也有别有用心心的。结果，曾经得到廖仲恺大力奖掖的宋子文，在仕途上，不但没有受到影响，反而更受重用，先后接任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及南方政府财政部长，成为南方政府的财政大臣，填补了廖仲恺遇害后留下的空白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宋子文在南方的地位，已经是任何人都不可轻视的了。

新的一年开始了，宋子文的仕途，仍以破竹之势前进。1926年1月，国民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，对中山先生的政治遗产——国民党党权，重新进行一次分配。宋子文继续居于有利的政治位置，不但被选进36人的中央执委会，而且被任命为中央党部商业部长，第一次打进中央权力圈，成为最年轻的国民党中央要人。在随后的二届一中全会上，先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、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、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，并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，甚至被选为国民政府五常务之一，与老资格的汪精卫、孙科、徐谦、谭延闿平起平坐了。这个时候的宋子文，一身兼任国民党南方政府党、政、军、财、商等五大领域要职，俨然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大人物了。

多少老资格的革命党人，跟着中山先生马前鞍后地干，真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，冲冲杀杀一辈子，也没能在南方政府里捞个一官半职，而宋子文却在两三年间唾手可得。这样一个结果，不能不让许多老革命党人感到不平。当然，除了宋子文的家族背景，我们不能不承认宋子文的机遇。当时的南方政府，正处于草创时期，各方面都需要展布新局，正是求才甚切的时候，尤其是财政金融人才，真可以说是思贤若渴了。南方政府有革命家，有政治家，有宣传家，也有军事家，但财经专家与金融长才，则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。物以稀为贵，人以缺为高。以宋子文的美

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及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头衔，又有一段纽约华尔街银行“练摊”的经历，老实说，这样的优秀人才，即便放在今天，也会让人肃然起敬，遑论是 70 多年前的那个时代。而一生爱惜人才的中山先生，且不论与子文有着父辈及子辈两代人的深厚渊源，即以他那种海纳百川般吸纳人才的雍容气度，也会对子文加以援引和重用。所谓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三者皆备，宋子文的崛起，正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演变。

事实上，宋子文的崛起，正是生逢其世，机逢其时。《晋书》所云：“有事之世易为功，无为之时难为名”唐杜牧所吟：“莫为霜台愁岁暮，潜龙须持一声雷。”即指此。“潜龙”子文出山伊始，正是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，由单纯的武装革命到建立政权的阶段。由此而形成对人才的全面需求，即不但要有政治家、军事家及党务专家，而且要有管理财政、经济、金融的长才。中山先生革命一生，身边聚集了大批党务、政治、宣传、军事人才，惟独财经及金融专才不多，不能不说是南方政府的一大遗憾。而宋子文的出现，不能不说是填补了南方政府的一大人才空白。这是宋子文能够冲天而起的最大因素。

所幸，中山先生没有看错，仲恺先生也没有看错，宋子文并不是一只绣花枕头。他的野心勃勃和真才实学，他的雷厉风行和大刀阔斧，他的聪明机敏和踏实肯干，都很适宜于在那个年代草创大业。于是，在南方政坛上，一颗耀眼的新星升起了！

中央银行之父

宋子文到南方打天下，是从筹建中央银行开始的，由此而奠

定了国民党中央银行创始人的地位。

走在今天的繁华市衢上，要找一所公厕方便一下，确是不容易；但要找一家银行，那是闭着眼睛也能摸到的。银行的作用，不但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推进器，而且已经渗透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但在宋子文到南方打天下的那个时代，中国人对于银行的认识，还处在开启民智的阶段。广州毗邻港澳，为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，得风气之先，情况也许好一点。但即使如此，办得好的金融机构，都是一些外商银行。英商的汇丰银行，渣打银行，有利银行，日商的台湾银行等，不但实力雄厚，且信用颇著，发行的纸币已经渗透到全省各地，以此操纵着南方的金融局势。

说到华商银行，只有嘉华、东亚等几家小银行在小打小闹；钱庄银铺倒是有几百家，但都是一些买空卖空的‘皮包公司’，稳定金融局势的本领是没有的，利用谣言跟风，制造金融风潮，却是第一流的本事。真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了。广州有一家官办的广东银行，但架不住政治风潮的冲击，已经奄奄一息了。事实上，中山先生虽开府广州，领导南方革命，但执广州银行业牛耳，在南方金融界呼风唤雨的，依然是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。洋人办银行，自有洋人的游戏规则。赚钱的买卖，当然会做的，不赚钱的买卖，偶尔也会做，那就是所谓‘政治买卖’，不外就是‘顺‘洋’者昌，逆‘洋’者亡’了。这对于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，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威胁。

当然，说到闹革命，自然离不开玩枪玩炮。但玩到最后，终究还是玩钱。没有钱，扯起旗，招不来兵，买不来马，也买不起枪，购不来炮。《九尾龟》说：“有钱诸事办。”虽然只是 5 个字，却是道尽了钱之大用，同现代的流行说法“钱不是万能的，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”正是异曲同工。中山先生闹革命，屡遭失败，原

因固多；但没有钱，经常陷于囊中羞涩的困境，没有稳定的后勤支援，是一大因素。现在，南方大局初定，党要改组，政要改造，军要重建，什么都要搞，但首先是要搞到票子。于是，创立中央银行，建立自己的财政金融系统，不能不成为中山先生的急务。

也许还可以举一个例子，说明创立中央银行的重要性。南方政府成立后，盐税成为政府开支的重要财源。宋子文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，一直将盐税收入存放在中国银行广州分行。1923年底，宋经理奉大元帅令，拟将存在该行的 11 万元税款提出，拨充军用。但该行百般托词推诿，拒不交付。随后，有关行员竟携带相关单据潜逃香港。好在这是南方政府的地盘，由不得他们胡来，大元帅一声令下，南方政府便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的不动产扣押查封，变卖抵款，总算弥补了盐务稽核所该项税款的损失。

不过，这样一个教训，给大元帅的刺激，给宋子文的刺激，真是太大，也太深了。中国人办的银行，还这样混账，外国人办的银行，还敢让人相信么？无论如何，要有革命政府直接掌握的银行，这是攸关革命成败的大事。否则，大元帅真是吃不甘味，睡不安席。这就是中山先生第三次开府广州后，第二个月就任命宋子文为中央银行筹备员的初衷所在。

大元帅的这道命令，在宋子文看来，正所谓“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间”。好在宋子文既有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理论，又有美国纽约华尔街花旗银行“练摊”的经验，还有上海联华商业银行、华义银行、神州信托公司小试牛刀的实践，把这些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，用于筹备中央银行，正是一展所长，实现自我价值的良机。

创办中央银行的第一步，是主持制订条例、章程及组织规程。这是蓝图的设计，也是未来运作的依据，不可不慎。但中国

人办、事，不可不认真，否则什么事也办不好，亦不可太认真，否则什么事也办不下去。但这个时候的宋子文，正是一头初生之犊，把一切都看得十分简单。以为纸上的东西，将来是要一条一条地实行的，当然是再三斟酌，反复推敲。于是，条例 7 条，章程 6 章 38 条，规程 12 条等，无不是对照西方货币银行学说，仿照华尔街银行的样本，引经据典地炮制出来，送交大元帅审阅，由大本营政务会议讨论通过。说到中央银行的特色，当然也是有的，这就是由宋子文规定可以享有政府授予的特权：代政府募集债款，代收各种公款，代政府创办国有实业及发行货币等，使中央银行真正成为南方政府管辖地区的金融中枢。

创立中央银行，最大难题，是筹集资本金。当时，南方政府一穷二白，早已是寅吃卯粮，哪里能筹集到足够的准备金。于是，宋子文通过时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贝祖诒的关系，拟议向中国银行借款 200 万元。以实力论，中国银行是华商银行中的“大哥大”，区区 200 万元，还是拿得出来的。但中国银行起于北方，总行亦设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北京，从而与北方政府的关系很深，甚至被视为北洋政府的“中央银行”。有这样的政治利害关系，自然不会为南方政府“两肋插刀”了。然山不转路转，石不转磨转，老谋深算的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，不想把事情做绝，也为了预留一条后路，让贝祖诒向总行请示，总算没有一口拒绝，并密嘱贝祖诒答允承借 50 万元，以敷衍一下南方政府的面子。

这点钱成立一个钱庄是绰绰有余了，但要创办一个中央银行，只能算是杯水车薪。没有办法，只好由大元帅出面，以南方革命政府的名义，向苏联借了一笔款，据说是 1000 万元毫洋，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这才有了着落。另由宋子文出面，向地方金融机构借了 18 万元，作为委托美商代印钞券的费用。

1924 年 8 月 8 日，是中央银行董事会成立的日子。这个日子选得很好，现代的俗语就是“发，发”了。董事会由 7 人组成，这是由大元帅亲自指定的，他们分别是：大元帅府总参议胡汉民，财政部长兼盐务署督办叶恭绰，大元帅府秘书长兼广东省长廖仲恺，两广盐运使邓泽如，中央银行行长林云陔（筹备阶段），南方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兼广州市长孙科，南方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兼中央银行副行长（筹备阶段）宋子文。廖仲恺任董事长，宋子文任中央银行行长。除了宋子文，其他董事都是名头很响的大人物。

8 月 15 日，举行中央银行开幕式，中山先生亲临会场，勉励各界共同维持中央银行信用，促成中央银行发展，“使中国商场上的经济力，不致为外国银行所操纵”。新任中央银行行长宋子文讲话，表示“自来官办银行，每因借垫政费过多，遂使周转不灵。本行自当恪守条例之限制，决不敢稍有瞻徇”。强调“本行现既发行货币，惟有十足准备金，决不敢超出定额”。这是一个现代银行家的远见，但也不能不说他对当时的环境还相当隔膜。

的确，历来的官办银行，毛病都出在信用太坏上面。原因不外是官家或军阀都把银行看成自己的钱袋，要用钱，伸手就取。金库的钱取光了，就拼命印票子。滥发纸币的结果，不外是造成物价飞涨，有钱买不到东西。等到客户发现上当受骗，赶到银行挤兑时，看到的却是一块‘停兑’的招牌，故此造成老百姓对官办银行的印象极坏。此前，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准备金被军阀劫夺，广东省银行滥发纸币 4000 万元等，造成客户挤兑局面，均不得不挂出‘停兑’牌，以应付危局，就是极好的证明。

当时，广东市面上的币制十分混乱，流通中的货币，既有银两、银元、铜钱等‘硬通货’，又有各种各样的纸币。就纸币而言，信用最好的是所谓‘港纸币’，为外商银行发行，信用最臭的是广

东省银行发行的纸币。因此，成立中央银行，不能不对这一问题予以最大关注。事实上，中央银行固然按十足准备金发行纸币，但人们在心理上，对官办银行抱有很深的信用危机，连带着中央银行纸币的流通，都成了绝大的问题，不但老百姓不愿使用，就是政府机构也不感兴趣。这也难怪，谁愿意把白花花的银子，眼睁睁地往水里扔呢！出现这样一个尴尬局面，对于宋子文的金融管理能力，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考验。

不过，年轻气盛的新行长，不但有背景，而且有办法。一切都处在革命时期，用不着瞻前顾后、左顾右盼，革命需要的是大刀阔斧的硬朗作风，需要的是雷霆万钧的霹雳手段。中央银行发行纸币，不是没有人买账么，不要紧，有革命政权撑腰，还怕玩不转么！

于是，新行长一纸呈文送到大元帅那里：窃职行奉政府特准发行货币，“所有公私款项出纳，自应一律通用，在公家征收机关，尤应专收职行货币，以示提倡。事关提倡职行货币信用，应请钧座明令各征收机关，所有征收田赋、厘捐、租税，及其他公款，均一律收受职行货币。其报解公款者，非职行货币，概不收受。至商民交易，应准其照额通用，视与现金相等，并请令行财政部暨广东省长通飭各征收机关并布告商民一律遵照。”

两天后，大元帅颁令批准该呈文，指令财政部长叶恭綽、广东省长廖仲恺，分飭各财政机关及商民一律收用中央银行的纸币。规定凡中央银行发行之货币，“公私出纳，一律收受。至缴解公款，应由解款人向中央银行换取货币，再行照解各收款机关。对于解款，非该行货币，不得收受，以利推行。”

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指示，也是一个必须贯彻的决定。但是，官办银行的信誉委实太坏了，无法让人信任。尽管有大元帅的训令，有财政部的公告，有广东省政府的通知，中央银行的纸

币，也还是受到机关和商民的冷落。更有人借着这一个事件，谣传政府将强迫商民使用中央银行货币等，以致更引起商民的恐慌。这当然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，宋行长不得不再发表一篇《中央银行紧要通告》，声明：“查本行发行货币基金充足，十足兑现，商民尽可于本行营业时间内，持币直接向本行兑换银毫，并无强迫使用情形，其中显系不法之徒利用谣言，希图毁坏本行信用。兹特郑重通告，凡商民人等持有本行货币者，可即向本行兑现，毋得轻信谣言，自后纷扰。”

为了便利商号人民兑换，使谣言不攻自破，宋子文下令在广州西关荣巷口及永汉北路设立了两个发行兑换处，每日上午 8 时起至下午 6 时止，星期日照常交易，凡有持中央银行货币兑换毫银或持毫银兑换货币者，均可随时交易，十足兑换。同时，中央银行另委托 8 家信誉较好的商业银行代理兑换业务。一切十分方便，一切都以事实说话，你还能不相信么？境况开始好转了，但是，备受冷落的局面，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，这是因为外币的信用，普遍要好于国币。在外币的挤压下，国币的生存境遇，不免要感受到巨大的威胁。

于是，南方政府颁布《取缔外币条例》，规定：“所有市面直接交易，概以国币为限，不得行用外币”；凡人民向征收机关缴纳田赋厘捐及其他公款，务须一律缴纳国币”。这是釜底抽薪的办法，外币被铲除了，你还能不用中央银行发行的国币么？而且，对于机关及商民以低价收买或拒绝使用中央银行纸币者，颁令“即行查拿严办”。

在南方革命政权的保护下，中央银行的纸币，终于在广东市面上流通起来。其他不说，仅广东的税捐一项，每月就有数百万元，必须以中央银行的纸币缴交。有了这个数百万元垫底，中央银行的国币，开始站稳脚跟了。

中央银行的局面，总算打出来了。但是，宋子文还是不敢掉以轻心。一个真正的商业银行，说到底，要靠银行本身的卓著信誉来维系。政权的保护，也许可以偶一为之，但不可再，不可三；否则，就等于是自断命脉。因此，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了，也流通了，但中央银行的信用问题，始终是宋子文特别关注的。他一次次强调：“货币流通，全恃信用。”这可以看出他的见地，也可以看出他的主张。

中央银行的信誉，一天一天地见好；中央银行的纸币，甚至在邻近广东的省区也开始流通起来。不过，宋子文丝毫没有陶醉，“鄙人初无点金之术，所恃者唯平日所积储之十足准备金而已。本行自发行货币以来，即谨守先大元帅训示之宗旨，所谓‘现兑’是也（即以现金兑换货币）。是先有现金，而后有货币，则准备必无丝毫之欠缺，以货币兑回现金，自无问题。”一切都可以看出他的小心谨慎和稳扎稳打。

不过，一切都还只是开始。政治的波涛，总是像黑色的幽灵一样，永远在银行的门外荡漾。为了维护中央银行的信用，宋子文不得不为之战斗。对于现代金融制度而言，最危险的敌人，是形形色色的军阀、政客、党棍等的野心分子。在他们看来，所谓的官办银行，不就是“四十大盗”的藏金宝窟么！那里面有着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金银财宝，不用白不用，不拿白不拿。

于是，面对中央银行所拥有的“财富”，这些野心分子早已是眼睛发红，嘴角垂涎了。只是，在最初的几个月里，由于大元帅还健在，打开这座藏金宝窟的钥匙，掌握在大元帅手里。在那个什么都缺，尤其缺钱的年代里，面对各种面孔的“伸手将军”，他始终坚持一条：必须遵守中央银行的规则，即便是大元帅，也不能有任何的例外。对于新生的中央银行来说，大元帅就像一座大山，替他们挡住了北方的寒流，也挡住了贪婪分子的图谋。